

诗歌翻译,期待更加规范化

□本报记者 黄尚恩

近日,由韦白翻译的佩索阿诗选《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刚出版便陷入一场争议之中。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闵雪飞撰文指出该诗集存在两个抄袭之处:一是韦白在译序中引用了她对佩索阿的一段评注而未加任何说明;二是诗集中收录的组诗《斜雨》除了个别字眼和语句,在整体上几乎完全“借鉴”了她与杨铁军之前共同翻译的译本。韦白发表公开信承认《斜雨》的第四节的确“有抄袭嫌疑”,但是“这首诗的其他章节,可以认为是参考失当,但绝不是抄袭”。随后,出版方世纪景发表声明,停止对该出版物的发货,并对编辑在出版过程中的失察深表歉意。这件事引发了大家对诗歌翻译的广泛讨论,比如:诗歌翻译中,同一个底本提供给不同译者的发挥空间有多大,“借鉴”与“抄袭”的边界在哪?如果过去的译本已经足够优秀,是否有必要重译?诗歌出版中,译者、出版方等应如何加强版权意识?

译者的发挥空间有多大

组诗《斜雨》的两个中文译本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句子。韦白的解释是,因为这是同一个诗人的同一首诗,而且是根据同一英文底本进行翻译,留给自己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我的译本,细心的读者一定可以读出与她们的译本不一样的地方”,“这些章节是否属于抄袭应该由诗歌翻译界最有成就的翻译家来界定”。针对韦白的这番解释,有一些网友根据该诗的英文底本各自进行翻译,翻译出来的文本“其貌各异”。因此,有一部分网友表示,两个不同的人自行翻译,想要出现像现在这两个译本这样具有如此大的相似性,是非常困难的。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谈到,在不同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诗歌文本提供给译者的发挥空间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何,不同译者对同一首诗的理解肯定会有所不同,因此在翻译中,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语气处理,都有一定的发挥空间。比如,叶芝的诗作《丽达与天鹅》,袁可嘉、余光中、袁小龙、傅浩都曾翻译过,每个人在翻译中都对它进行了不同的处理。而且,使用不同的文本来翻译同一首诗,译者的发挥空间就更大,用五言古诗和自由体诗来翻译《海滨墓园》,出来的文本肯定不一样。

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确实会出现“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形。诗人西川举例说,“《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的时候,72位翻译家分成不同的组,组与组之间翻译出来的东西差得不是太多。”在西川举的这个例子中,不同的组之间应该还是没有互相参考的。在韦白已经承认自己有所参考的前提下,两个译本过多的相似性难免给网友带来众多想象的空间。对于这是“参考失当”还是“抄袭”,不同的网友给出不同的判断。对此,唐晓渡表示,在翻译中参照已有的译本是通行的做法,

但目标是为了翻译出自己的风格。如果一首诗翻译出来之后,让人感觉这个译本和之前的译本有太多的相似性,“就翻译的创造性来说,就比较遗憾了”。

如何进行合理地参考,而又不至于失当呢?翻译家屠岸的一些翻译经验可以借鉴。屠岸翻译的很多作品都是首译,但也有有一些是别人已经翻译过的。对于后者,屠岸一定先自己翻译一个初稿,然后再看别人的译本,从别人的译作中发现自己理解错误的地方,然后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改进。屠岸表示,如果先看别人的译作再去翻译,“那他的风格会影响到我的风格,他的理解会影响到我的理解”,所以这个秩序不能颠倒。如果自己的译作跟已有的译本差不多,“只要是自己翻译的,这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一般只是个别的句子、个别的章节相同,不会是整首诗相同”。

过多的重译是否有必要

在这场争论中,有网友发帖称韦白之前翻译的一些狄兰·托马斯诗作也涉嫌抄袭巫宁坤的译本。韦白在公开信中解释说,有一些作品,已经有很好的译本,不一定非得推倒重译。有些译者为了回避已有的翻译,而不得不进行拐弯抹角的转变,这样即使是优秀的诗歌翻译家,为了避嫌也有可能把一首很好的作品译坏。巫宁坤翻译的几首狄兰作品是公认的译作经典,所以他在翻译这些诗作时确实过多参考了巫宁坤的译本。

韦白用这段话为自己辩白,受到了网友激烈的反驳。韦白也表示,借鉴了却未加注,自己的确有失当之处。但是韦白提出的“重译的必要性”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的确,重译是有必要的。诗人王家新表示,翻译有一个绝对的目标,不论多么优秀的翻译者都很难真正达到它,因此翻译是无止境的。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每一代都应该有自己的译者去翻译它,让原作的声音从不同翻译中呈现出来,用本雅明在《译者的使命》中的话来讲,使原作的本质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

但是,对于一些知名的外国诗人,经常是你翻译完我再翻译,译本与译本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别,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加以警惕。王家新认为,翻译家进行重译之前应该反复问自己,自己的翻译是否有独特的价值。如果觉得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没有自己独特的贡献,那还是慎重重译。现代文学史上,卞之琳从法文翻译了里尔克的《旗手》,冯至认为翻译得很好,就没有再从德语翻译这首诗。这是向同行致敬的一种方式。当然,很多诗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外国诗人,他把翻译作为自己深入阅读的途径,从不考虑出版,那就另当别论了。

现在的外国诗歌,有两种情况最急需翻译。西川表示,如果一个外国诗人,他的作品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

扶持校园诗人 繁荣校园诗歌

——“2013中国·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开营



参观盐业历史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明江) 7月24日,“2013中国·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在盐都自贡举行了开营仪式。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等全国18所高校的22名大学生诗歌爱好者将在自贡进行4天的青春诗歌之旅。

“2013中国·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活动,是自2007年由《星星》诗刊杂志社和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联合发起以来的第6届活动。在为期4天的夏令营活动中,大学生诗歌爱好者将通过参观盐业历史博物馆、恐龙博物馆等,感受自贡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并与《星星》诗刊编辑部和自贡市的本土诗人进行诗歌交流。据悉此次夏令营创作的诗歌将在《星星》诗刊开辟专栏发表。

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与大学校园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很多颇有建树的诗人正是以“校园诗人”的名义进入诗坛的。《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表示,大学生的诗歌一直呈现出丰富的元素,举办“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活动正是为了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扶持校园诗人、繁荣校园诗歌,改善当下新诗在高校诗歌教学中的薄弱现状,为未来诗坛的发展培养和选拔后备力量。事实也证明,这几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

文化部出新政力挽地方戏 “观众减少、市场萎缩”困境

据新华社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影响,地方戏曲面临着观众减少、市场萎缩等困难,地方戏曲剧种的保护迫在眉睫。”这是文化部对当前地方戏曲剧种现状的基本判断。

基于此,文化部日前决定实施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这一计划以现有各种体制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为基础,以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地方戏曲艺术家为骨干,以切实可行的政策为保障,以一定的经费投入为支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有利条件,全面加强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推动地方戏创作和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建设。

文化部确定的基本目标是:以5年为周期,确立40个左右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创作一批地方戏优秀作品;培养一批潜心地方戏曲艺术、德艺双馨的专门人才;挖掘、整理

一批珍贵的地方戏曲史料,使其成为地方戏曲剧目创作中心、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中心、地方戏曲艺术传播普及中心和地方戏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中心,逐步建立地方戏曲艺术生态保护区。文化部艺术司有关负责人说,在实施保护与扶持计划过程中,要以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促进地方戏曲精品力作和优秀人才竞相涌现为根本目标,充分发挥各种体制的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团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根据这一计划,文化部将积极会同财政部门争取设立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专项资金,对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剧目创作、人才培养、史料抢救与保存、赴境外演出等给予资金扶持。文化部要求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对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给予资金支持,各地扶持资金原则上不低于文化部资金支持额度。(周 玮)

“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

关注30岁以下青年作家

本报讯 专门针对30岁以下作家设立的全国性文学大奖——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新闻发布会7月20日在南京举行。该奖项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江苏省作协联合创办。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勇、《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评奖类别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非虚构文学、文学评论、特别文体等类别。该奖评选的作家和作品范围包括2012年1月至2013年6月在国内各种文学期刊、报纸与出版社发表或出版的30岁以下青年作者的

作品。目前该奖已经过提名和初评、复评两次评审,产生了进入终评的候选作品。

以鼓励有梦想、有精神追求的作家为目的的“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把目光锁定在那些艺术地探索精神处境、人性状态以及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的作家作品上,并以此与大众熟知的“青春文学”区别开来。《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表示,强调30岁以下,是为了发现更多的青年作者,检验年轻的创作阵容。

据悉,该奖项将连续5年落户江苏,首届颁奖礼将于8月底或9月初在南京举行。(刘 颖)

作家评论家寄语青少年写作

热爱文学 放飞梦想

本报讯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等单位主办,以“真实的体验、新鲜的创意、确切的表达”为写作总要求的第六届文心雕龙杯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写作大赛日前在京举行。参与此次活动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对孩子们的写作表现出来的文学天分和创造能力表示积极肯定,并对他们今后的写作提出了殷切希望。

庄之明认为,应该多举办一些有价值的活动,为孩子们展示写作才华,实现文学梦想搭建平台。人生贵有梦想,有梦想就有希望。文学可以传播梦想,带领人们仰望星空。少男少女的梦想有着青春的颜色和朝气,是一个民族最富于活力、最有生机也是最能动的追求。梦想是生命的灵魂,是心灵的灯塔,是引导人走向成功的信仰。有了梦想和矢志不渝的追求,就有可能成为现实,奋斗就有可能变成壮举,生命就会创造奇迹。不管是否成为作家,与文学相伴,会终生受益。

在曹文轩看来,写作绝对不单是作家的事。人要多做立志让自己走向完美的事,不论今后从事什么工作,能写上一手好文章,就能够从一方面体现出他

的美德。当然能写好文章的前提是多读书。现在的图书丰富以至泛滥,但值得看的并不多。在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都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应该读一些经典。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而天下的书是无限的。只有多读经典,才会成为智慧的人。

张之路十分欣赏此次活动倡导的“选材生活化、情感真实化、视角独特化、构思创新化、思想审美化、手法灵活化、语言个性化、文风朴实化”。他说,这就像同一条河流,当我们坐着小船漂荡,是一种烟波浩渺的感觉;而站在高山上,它就是一条玉带。从不同的角度切近,常常会是一片新的天地。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该会校园文学委员会主任吴敬敬表示,文学对一个人未来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要在青少年的心里播撒下文学的种子。孩子们长大后可能会从事不同的行业,但有了热爱文学的心和很高的审美能力,对今后的生活道路都非常有好处。一个人是否成功,在于人生达到一定高度的境界。(江 湖)

电影《警察日记》在京首映

本报讯(记者 王冕) 7月23日,由公安部宣传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电影《警察日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式。

《警察日记》取材于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公安局原局长郝万忠的真实事迹。2011年,41岁的郝万忠在体能训练时突发心脏病不幸殉职。从当上刑警到去世的14年间,他成功破获了2000多起刑事案件,不仅解决了农民工讨薪、群体性煤矿罢运等尖锐的社会难题,还留下了68本工作日记,日记中写满了他对每个案件的详细分析和记录,以及对工作和人生的感悟。影片以这些日记为贯穿始终的主线,生动讲述了郝万忠执法如山、惩恶扬善、心系百姓、清正廉洁的感人故事,也成为全

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部生动教材。

专家表示,电影《警察日记》在纪实题材创作、英雄人物塑造和主旋律影片艺术化等方面有所突破,提供了新鲜和宝贵的经验。影片通过严谨独特的叙事逻辑和大量富有想象力的镜头语言,呈现了生活的真实质感,让观众逐渐走进郝万忠复杂的内心世界并为之感动。该片还打破了以往警察题材作品侧重于案件侦破的固定模式,采用多视点、多时空的不断穿越,通过一系列记者采访、案件和社会焦点事件回溯,借不同采访对象的讲述和解读,全方位立体式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公安局长形象。

《警察日记》由宁瀛执导,芦苇任文学统筹,宁岱任编剧,王景春、陈维涵、孙亮、侯岩松、张杰等主演,将于8月在全国上映。



电影《警察日记》剧照

写丑也应该是为了审美

□蔡毅

近一段时间,文学艺术领域一股低俗、粗鄙、以丑为美的思潮值得警醒。美术方面,一些庸俗浅薄、浮华夸饰、丑陋难看的画作堂而皇之地占据着我们的美术馆和画廊。文学方面,某些展示恶俗、呈现污秽、一味放大人性丑恶、世道险恶,以欲望取代愿望、煽动取代感动、快感压倒美感的作品,让人失望和沮丧。影视剧方面,“烂片”充斥,闹哄哄的名著翻拍,加上婆媳争锋、姑嫂斗法,还有雷人神剧要圆搞怪,闹得乌烟瘴气。

美与丑原是一对冤家,两者间的交锋、争斗、纠缠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审美丑的是什么呢?当审丑压倒审美,人们的趣味向着丑偏移时,我们的价值观混乱了。这让观众和读者只知道丑,却不懂得美;只相信坏,而不相信好。若不正视,将呈愈演愈烈之势。在崇美与迷丑、“向上”与“向下”的两难抉择中,驱散“精神雾霾”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需要树立一种“莫为浮云遮望眼”的气度,站在整个人类文化和审美的高度来辨别美丑、善恶、是非,不为某些流行的庸俗、怪诞甚至以丑为美的趣味所迷惑。艺术的目的是传递文明,传播真善美,使人变得更为真实和完美,让世界变得更加光明和美好,而不是相反。

诚然,艺术作品中必然要写到“丑”,也需要写到“丑”,但是,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明确,写丑也是为了审美。高明的艺术家即便在暴露丑与丑时,也从不忘向人们展示希望和光明的另一面,其作品的基调绝对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美终将压倒丑。因为,人们所以需要文学艺术,更多还是想从中获得真的启迪、善的滋养、美的享受。所以,作家艺术家应通过自己的作品发出生命的光焰,驱散迷惑人心的雾霾。

